

黃埔當年鐵與血 (一)

喬家才

——四十五年前的陸軍官校學生

大打出手砸了票箱

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，正如黃埔校歌所說的，澎湃的革命怒潮，激動了每一個青年人的心弦，一批緊接着一批，奔向革命的搖籃——黃埔。我向滄海一粟，隨着大時代的革命洪流，由北向南流去。談到上黃埔去，就我個人來說，絕不是隨波逐流，湊湊熱鬧，的確是信仰所發生出來的力量，推動着我往前走。信仰來自兩方面，一方面是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，另一方面是對於校長 蔣公的信仰。這兩種信仰結合在一起，所產生的力量，強大無比。

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）第二次直奉戰爭，直系的馮玉祥等起義倒吳，成立國民軍，拖垮吳佩孚。馮玉祥為國民一軍，胡景翼為國民二軍，孫岳為國民三軍。奉系張作霖和國民軍聯合歡迎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上，共商國是。國父北上時，發表宣言，主張召開國民會議，國是由全體國民的代表來商量解決。不想張作霖和馮玉祥在

國父北上途中，又擁護段祺瑞為臨時執政。段祺瑞反對 國父的主張，提出召開善後會議，以抵制 國父主張的國民會議。十三年底， 國父到達北京，癌症已很嚴重，十四年（一九二五年）三月十二日病逝協和醫院，臨終遺囑，猶念念不忘：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，尤須於最短期間，促其實現。」

國父北上，雖然沒有解決了國是，可是却把革命的種子帶到北方。他的偉大精神震撼了北方的廣大青年，紛紛加入國民黨，擴大了革命的力量。我是民國十三年冬天，讀完三民主義、建國方略、建國大綱以後，加入國民黨的。 國父北上以前，黃埔軍校已經成立， 國父沒有看到國民革命軍成功，飲恨逝世。但是校長 蔣公本着 國父的革命精神，統率黃埔學生東征，擊潰陳炯明、楊希閔、劉震寰，統一廣東，奠定了革命基礎。因此，我對校長 蔣公興起和對 國父同樣的信仰，願意在他領導之下，為完成國民革命而奮鬥，而犧牲，加強了我到黃埔去的決心。

在我加入國民黨，未到黃埔以前，有幾件事情，至今記憶猶新，值得一敘。

(一) 國父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，是想增強國民革命的力量，不想共產黨根本不講信義，他們在國民黨內，並不同國民黨的同志合作，而是處處對立，甚麼都要爭奪，甚麼都想把持。在太原那一段時期，每開一次會，祇要有共產黨分子參加，就得吵架。吵的最兇的一次，是十四年冬天，在文廟圖書館三立閣開會，選舉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，中央派山東王樂平到太原監選。投完票，共產黨估計投票的情形，知道他們沒有佔到便宜，立刻爭吵起來，繼而大打出手，最後，連票箱都砸啦。我才知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，並不是為了信仰三民主義，為了國民革命，完全是掛羊頭，賣狗肉，假借國民黨的組織，來發展共產黨的組織進一步來篡奪國民黨。我相信共產黨在國民黨內，終久是國民黨的禍害。

(二) 為響應 國父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，在 國父未到北京以前，各省先後組織「國民會議促

仙，你又何必多管呢？」父親在裏面說話了。真的，父親從來沒有干涉過我的信仰和行動。我房間裏懸掛着 國父的照片，父親也沒有說過甚麼。

「有病得請醫生看，讓神仙來驅鬼，是戲耍人命。」說完話，我感覺到語氣有些太重，對父親說話，怎麼可以這個樣子？在兄弟當中，父親對我好，從來沒有責罵過我，我怎麼可以頂撞他老人家呢？隔着竹簾，我向裏面一看，看見父親的臉色很不好看，好像很生氣的樣子。他正在下炕，準備穿鞋子。一種下意識告訴我，大概是闖下禍啦，父親氣極了，要出來揍我。「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。」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拔腿就往外跑，一口氣跑出裏院，跑出門，轉過牆角，才緩了一口氣。

告訴聲太太我要走啦？

現在不需要再躊躇了，家不能再回去，一心上黃埔吧！跑到自家的店舖裏休息了一會兒，心想，這一次到南方去，十之八九是一去不返，幹革命，遲早都是要犧牲的，既然這樣，總應該同妻打個招呼吧？妻的家是鄭村，距我家不過十二里，踏腳踏車，二十分鐘可到，於是踏車到岳丈家，和妻告別，我告訴他：「我要走啦！」

「你到那裏去？」妻問我。我沒有告訴他，家裏發生甚麼事故。

「先到北京。」

「去多久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也許三年，也許十年。」妻

以為我去北京是考學校，所謂也許三年，也許十年，是同他開玩笑。其實這一次生離，也就是死別，緊握住妻的手，臉上裝着笑臉，淚却往肚子裏流，他那裏知道我就要去黃埔呢。這一次同妻分別，不同以往，第一次嚐到生離死別的滋味。妻却蒙在鼓裏，還以為和過去一樣，不過是暫時的分別。

第二天上午，到達公路旁邊，等候搭乘由西邊開過來的客車，好去太原。二哥送我上汽車，他是個老實人，糊裏糊塗，也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。到了太原，不敢逗留。怕父親發覺我出走的情形不大對勁，萬一派人追趕來，攔阻我，該怎麼辦呢？所以，太原祇住了一夜，搭上早班正火車，去石家莊，轉往北京。

這次出走，既然違背了父親對我所抱的希望，我就不好意思多拿家裏的錢。況且我去黃埔，是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，拋棄舊的一切，去創造新的人生，必須咬緊牙關去吃苦，也無須多帶錢，損傷自己的意志。錢攜帶少了，就不能住旅館，幸好有一位同學——陽高劉厚，住北京平民大學，住在德勝門裏狗尾巴胡同的一個大雜院裏。他看起我這個到黃埔去的同學，邀我住在他的寓所，連吃飯都不要我花錢。我去黃埔的一切，都由定襄梁亨甫（永泰）師安擺，他住在東城王府大街定襄董鏡如家的木廠裏，須要經常去聯絡。由狗尾巴胡同到王府大街，必須經過什剎海、後門（地安門）、皇城根、沙灘，一來一往，差不多要走兩個鐘頭。坐電車去，也許快些，可是一分錢也不能浪費，連電車也不敢坐，祇好安

步當車了。

北京是一座非常危險的城市。奉軍和國民黨聯合打垮直系吳佩孚，沒有多久，張作霖又和馮玉祥翻了臉，奉軍把國民黨趕到西北，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去了俄國，臨時執政段祺瑞也被擠下臺，張作霖做了大元帥，成了北京的統制者。「張大帥」沒有山西閻百川先生的那份雅量，他捉住共產黨要殺，捉住國民黨也要殺。我初次出遠門，就來到這殺氣騰騰的北京城。「張大元帥」雖然那麼厲害，可是我在北京接觸到的人，又都是國民黨，他們都在奔走革命，根本沒有把「張大元帥」放在眼裏，不怕他捉去殺頭。現在夫婦為立法委員的河北韓振聲和王冬珍，都是當年最活動的國民黨。尤其王冬珍委員是北京城裏女國民黨的領導者，手裏拿把洋傘，經常到王府大街董家木廠去，來去匆匆，我碰見過好多次。北京的革命氣氛非常高昂，和反動勢力正好成個反比例。據說黃埔不收有沙眼的學生，亨甫師拜托韓振聲先生帶我到和平門外，去找一位眼科大夫，為我檢查眼睛。

太原有好幾位同學給我來信，要我等候他們，一塊兒南下。七月下旬，我們集合了十個山西籍的同志，踏上去黃埔的旅程。十個人中間，有五個是平民中學的同學。同現任立法委員孫子揚、郭紫峻，國大代表蘇夷士同班的交城王介夫（和衆），同中央黨部第二組副主任侯安國同班的靈邱李冠三（封嵐）、朔縣熊昌壽，同我同班的靈邱張靜齋（存仁）；另外五位是山西省立第四中學的晉城張子仁（鴻惠）、魏志青、黃匯川（

應海)，北京匯文中學的要襄邢伯涵（淵經）和國民二軍的朔縣吳月卿。

住會館一文錢不花

南京是五省聯軍孫傳芳的根據地，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的主要對象。我們離開北京的時候，國民革命軍已經在廣州誓師，開始北伐。我們是去黃埔的，路過南京假如被孫傳芳捉去，非殺不可。為避免意外，我們不走陸路，由天津乘輪船直達上海租界，這樣一來，就不怕他孫傳芳了。路過天津和上海，都有亨甫師為我們約好的國民黨同志來照顧我們，他們對我們這十個去黃埔的陌生人，照顧得非常週到，請我們吃飯，領我們逛街，替我們購置船上需要的用品和食物。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同志之間最珍貴的友情。

上海到廣州，中途要在廈門停一次船，上下貨物。廈門屬於孫傳芳五省聯軍的勢力範圍，過了廈門，輪船直駛廣州，就沒有風險了。因為沙基慘案，英帝國主義者開槍打死我們的遊行羣衆，省港工人罷工，封鎖香港，抵制英國人，到香港的船隻，不准開往廣州，到廣州的船隻，路過香港，也不停留。上海上船的時候，不知道船上的乘客是些甚麼人，輪船離開廈門後，氣氛立刻變了。船艙裏的乘客，一個個都走上甲板，突然熱鬧起來。原來全船的乘客，一半是二十幾歲的青年，都是上黃埔去的。人聲嘈雜，說話的口音，聽起來南腔北調，仔細一打聽，有些人是東北人，有些人是山東人，有些人是河北人，有些人是甘肅人，有些人是陝西人，有些人是徐州府

人，有些是上海人，有些是浙江人，有些人是江西人，有些人是四川人，還有我們十個山西人。

輪船快過香港的時候，海上的船隻漸漸多起來，不論大船小船，船尾都插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。我們對於這幅象徵光明自由的美麗旗幟多麼嚮往！在過去，我們在開會時，也曾懸掛過這種國旗，不過偷偷摸摸掛掛而已。在大街上，在稠人廣衆的場合，所看見的，都是「紅黃藍白黑」五條顏色的旗子，現在，忽然看見這鮮艷美麗的國旗，船上的青年們高興的歡呼起來，有的鼓掌，有的蹦跳，像一羣瘋子。快到虎門，老遠就可以看見兩旁削壁上寫着兩句醒目的大字標語。原文已經記不清楚，好像是「打倒帝國主義」和「實行三民主義」。越靠近虎門，字也就更大起來。這種革命的情景，以往誰都沒有看見過。當輪船將要駛進虎門的時候，船上的青年們又一陣鼓掌歡呼。現在，事隔四十多年了，每次回憶起當年的情形，熱血猶在沸騰着。

八月十一日我們到了廣州，住在鹹坪街的一座破破爛爛的山陝會館裏。我們都沒有攜帶甚麼東西，不怕被偷竊，會館雖然破爛，沒有門窗，可是不要花錢。亨甫師有封介紹信給山東丁維汾先生，丁先生的聲望很高，北方的國民黨同志到了廣州，差不多都要去看他。他已到了前方，我們沒有看到他，由他的秘書路友于先生給黃埔軍校入伍生部寫了一封介紹信，介紹我們去投考。入伍生部在長堤天字碼頭，我們到了入伍生部，交了介紹信，立刻舉行考試，題目非常容易，我們都有信心，不會考不上。又過幾天，再去入伍

生部打聽消息，我們十個人全部錄取，命令我們去燕塘入伍。

八月二十九日，吃過午飯，我們十個人徒步向燕塘走去。燕塘也叫沙河，在廣州東北十里，瘦狗嶺（白雲山）的前面。這條道路兩旁，有許多革命先烈的墳墓，有史堅如墓，有朱執信墓，有廖仲凱墓，有紅花崗四烈士墓，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。這些墳墓告訴我們，「死有重於泰山」，為革命而死，死得非常有意義。我想黃埔軍校把入伍生訓練營地擺在燕塘，是有重大意義的。在沒有入伍生受訓之前，先讓你走過這一條革命大道。革命的道路，是先烈們用熱血和白骨舖成的。所以，走過這條道路，會留給每一個青年永遠不會磨滅的深刻印象。

瘦狗嶺前面，右邊是一片廣闊的操場，據我估計，一師人在操場上操練，也是寬寬做做。左邊整整齊齊排列着一棟棟竹架子的茅草營房，究竟有多少棟，我沒有仔細數過，總之有好多棟。每連兩棟，一棟是寢室，一棟是教室兼飯廳。黃埔軍校嚴禁吸煙，據說就是因為這種茅草房子容易起火，吸煙最會引起火警，所以不能不嚴禁，以策安全。我們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三營第十一連，團長郭大榮上校徐州府人，保定出身，營長係第一期同學，江西李靖難少校；連長雲南盧潛泉上尉，雲南講武堂出身。我們十一連的同學，有好多人面孔非常熟習，原來都是由上海同船而來的。吃過晚飯，有好幾批第四期的山西同學來看我們。第四期還沒有畢業，正在燕塘做畢業野外演習。

「勿拉」排長一頓臭罵

我們穿着長衫到連部報到，原來的衣服全部脫下來，換換粗白布襯衣，灰布軍衣，灰布綁腿，黑布襪子和草鞋。每一個人的頭髮都被剃光，一個個變成和尚。入伍還不到一個星期，每人就領到一支步槍，由徒手教練變成持槍教練，進度神速，我們都成了天才入伍生。發槍的這一天下午，快要收操的時候，全營第九連、第十連、第十一連（十二連還沒有編成）集合在一起，排成一個U字形，營長站在臨時移置的木臺上向我們訓話。太陽將要西沈，天空一片橘紅色，把整個操場都照紅了。營長祇講了十幾句話，聲音宏亮，簡單乾脆，句句有力，量可以打動每一個人的心弦。他說：「現在在你們每人拿到一支槍，要知道！這些槍支得來不易，是先烈們流血拼命，從敵人手裏奪回來的。希望你們要愛護它，好好保管他。」

燕塘訓練不到兩個星期，我們十一連就開往魚珠去駐防。那一天在路上，突然下起傾盆大雨，越下越急。我們這一連剛入伍的新兵，靜悄悄地在雨中行軍，祇聽見雨點落地的沙沙聲，腳踏雨水發出來拍拍聲。我們雖然穿着雨衣，雨衣却擋不住急迫的雨水，衣服濕了，背包也濕了。背包裏放着新發的書籍，書着了雨，背包越背越重，簡直背不動了。當兵的滋味，原來就是這個樣子，不過，我並沒有感覺到苦，這不過是人生的另外一種生活方式。要把一個人訓練成像鋼鐵一樣堅強的軍人，就必須經過種種磨練，雨算個

甚麼。

魚珠沒有住幾天，又開到黃埔對岸的牛山，防守牛山砲臺。一連人住在砲臺底下存放砲彈的地下室裏，裏面潮濕和發霉的氣味，薰得人透不過氣來，幾乎要嘔吐出來。連長和排長一再告誡我們，廣東的土匪非常凶悍，會從你的手裏搶奪槍支。不過，在從前要一團人駐防的地方，現在我們駐一連人就行了。因為土匪們很害怕我們學生軍，他們以為一連學生軍比一團普通的隊伍還厲害。北伐軍出發以後，後方沒有留下多少部隊，廣東的治安，就全靠我們第五期和第六期的入伍生來維持。第五期和第六期的入伍生是怎樣區分呢？據說八月一日以前入伍的，都算第五期，八月一日以後入伍的，就是第六期。第六期入伍生一共兩團，有四千多人，我們第一團有十九連，另外還有一個機槍連。

牛山並不太高，山頂有一座砲臺。有一天半夜裏，我的哨位在牛山的山脚，熊昌壽剛好在山頂的邊沿。我看見正前方一閃一閃向我的哨位走來。心想，這大概就是所說的土匪了，也許真的要來搶奪我的槍支，越想越怕。眼看那閃光就要走近我的身邊了。我撒腿就往山上跑，一面喊叫：「土匪來了。」熊昌壽聽見我喊土匪來了，他也害怕起來，跟着我喊叫。他距離砲臺近，立刻把排長喊了出來，我也已經爬到山上了。

「既然是土匪來了，你為什麼不開槍呀？要是真的土匪，老早把你打死了，讓你喊個屁！」排長也是雲南人，講起話來，勿拉勿拉，大家都叫他「勿拉」。排長弄清楚是怎麼一會事，把我

臭罵一頓。

「報告排長！我連子彈都不知道怎樣裝，你叫我怎樣開槍？」我說的是實話，排長聽得都笑啦。據說在我們開拔魚珠的前一天，曾經打過一次靶！那一天，我請假到了廣州，沒有參加。因此，我不但不會開槍，連裝子彈都裝不來。讓這樣的一個新兵，半夜三更，放步哨放到山腳下，真是作孽。

那可悲可恥的怪現象

黃埔政治部主任是熊雄，一個重要的共產黨。政治部完全由共產黨把持，無異是共產黨在黃埔的司令部。他們利用政治訓練，控制着學生的思想和行動。他們要把黃埔學生訓練得一個個背離了三民主義，變成共產黨的工具。共產黨的理論家鄧代英、鄧中夏、蕭楚女、施存統、廖划平等都是黃埔的政治教官。這些人能言善辯，口吐蓮花，都是辯證法「專家」，可以把無說成有，可以把死人說成活人，很容易得到學生們的信仰。我們曾聽過蕭楚女演講，事後，好多同學佩服得不得了，贊不絕口。其實他所講的並無內容，完全是迎合青年人的心理，講些討好青年的話。共產黨處處在為爭取同學下功夫，一個對三民主義沒有堅強的信仰，對共產黨的陰謀，認識不够深刻的青年，很容易上他們的當，被他們引入歧途，而不自知。

以前，黃埔軍校有兩個公開的學生團體，一個叫做「青年軍人聯合會」，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，他們利用這個團體拉籠同學、爭取同學、藉

以擴展共產黨的組織。另外一個團體叫做「孫文主義學會」，是忠實的國民黨同志所組織的，藉以自衛，藉以對抗共產黨的橫行霸道，這兩組織勢不兩立，互相攻擊，經常衝突，以至打鬧。這種情形發展到第三四期，打鬧得最凶，影響到秩序和紀律。後來校長下令，解散了這兩個團體，另外成立了一個黃埔同學會。黃埔同學會成了已經畢業同學的組織，對於在校未畢業的同學無法領導，起不了組織作用。這樣一來，共產黨更其為所欲為肆無忌憚。因為，共產黨本來就有他們的秘密黨團組織，又可以拿上政治部這個行政機構公開活動，他們的外圍組織「青年軍人聯合會」雖然取消，對他們毫無損害。共產黨分子仍舊在他們自己黨的組織之下，有計劃，有步驟，對付國民黨同志。國民黨的同志呢？因為「孫文主義學會」解散，成了無組織的一盤散沙，無法再同共產黨開爭對抗，祇好任由他們宰割了。關於「青年軍人聯合會」和「孫文主義學會」過去打鬧衝突的情形，第四期同學曾經詳細告訴我們，因此，我們知道的很清楚。

我們入伍不久，各連連黨部和團黨部先後成立，黃埔特別黨部也重新改組，在共產黨有組織，有計劃的操縱之下，各級黨部的執行委員幾乎都是共產黨，各級黨部都被共產黨分子所控制。國民黨同志瞪着眼睛乾着急，一籌莫展。結果，國民黨的各級黨部都變成共產黨的工具，用來打擊國民黨的忠實同志，用來迫害國民黨的忠實同志，這不是一種可悲可恥的怪現象嗎？

各連的共產黨分子對於每一個同學，都先做

過一番調查分類。他們把同學們分成五類，第一類是他們共產黨和CY（共產主義青年團）自己；第二類是他們認為思想進步的積極分子，也就是他們爭取吸收的對象；第三類是好出風頭，愛講話的同學，最容易利用的分子；第四類是政治興趣不高，不論對甚麼事情，都是無所謂的中間分子；第五類是忠於國民黨的同學，也就是他們當作敵人看待的所謂頑固分子。共產黨有時也會搞出錯誤，不知甚麼緣故，他們把我誤認為是他們的同志，找我開過會。入伍後三四天，有一個雲南籍的共產黨同學，約我吃過晚飯，到操場那邊的一個墳墓所在去開會，我想看看他們變甚麼把戲，準時到達，結果祇看見他一個人，他說情況不對，改天再開，以後却再也沒有找過我。我想，一定是通知我參加他們的秘密會議以後，才弄清楚，我不但不是他們的同志，而是他們的敵人，所以不再理我。

他們對付各類同學，有一整套辦法。對付他們認為思想進步的第二類同學和愛出風頭的第三類同學，共產黨用抬和捧的方法。開會時，抬這兩類同學做主席，做記錄。等到個別批評的時候，對這兩類同學大捧特捧，高帽子左一頂右一頂戴給他們，說他們怎樣革命，怎樣思想進步。經過一抬，一捧再捧，這兩類同學真以為自己的思想進步，言論行動最革命，其實已經入了共產黨的彀，被共產黨麻醉，自己還不知道。對付第四類同學，共產黨用車輪戰術，一個接一個和他們個別談話，討論問題，鼓勵他們閱讀政治書籍，向他們灌輸共產主義毒素。經過這樣宣傳說服，

認為他們有進步，開會的時候，也用抬捧方法，把他們由消極抬捧成積極，把他們從中立或無所謂拉到左邊，跟着他們屁股走，才肯罷休。對付他們認為最頑固的第五類同學，在背後造謠中傷，開會時侮辱打擊，逼着向他們低頭屈膝。一個意志薄弱，立場不够堅定的人，在那種環境，那種氣氛情況下，不向他們投降，也會被他們逼成精神病。

來上臭「東山會議派」

共產黨製造了五頂反革命的帽子，戴給第五類的同學。所謂五頂反革命的帽子，叫做：右派、新右派、國家主義派，西山會議派和東山會議派。共產黨認為不左即右，一個人絕對不能站在中間，凡是不跟着他們走的，都是「右派」。好像一頂右派帽子，運用起來不够靈活，於是再製造一頂「新右派」的帽子。國家主義係指曾琦、李璜、左舜生、余家菊、常燕生等的青年黨，青年黨主張「外抗強權，內除國賊。」國賊就是指共產黨，共產黨當然不高興，說他們的思想最不進步，最狹意，最反革命，說他們祇知道國家，不知道世界大同，就他們叫做「國家主義派」。西山會議派是怎麼來得呢？原來民國十四年國父逝世後，一部分國民黨同志鄒魯、謝持、林森、居正等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 國父靈前開過一次會，他們看到共產黨在國民黨內，飛揚跋扈，喧賓奪主，着實可恨，主張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開除出去。因此共產黨最恨這些人，就給他們起了一個「西山會議派」反革命名詞。共產黨說

聯俄、容共，農工三大政策是 國父定的，反對共產黨就是反對三大政策，反對三大政策就是反對 國父，反對 國父就是反革命。在共產黨的邏輯之下， 國父也被他們利用了。共產黨所說的西山會議派既然反對共產黨，共產黨自然要把他們說成反動派。「東山會議派」這頂帽子，是共產黨特別為黃埔同學製造的，運用這頂帽子的時間，大概是十五年冬到十六年春，前後不會超過五個月，除了當時在黃埔的人們知道這個名詞，別人很少知道。

北伐軍打下武漢，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那裏，一切都把共產黨把持了。此時汪精衛從國外回到上海，不聽國民黨同志勸告，不經國民黨同志同意，自以為國民黨的領袖，和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，然後悄悄跑到武漢，剛好被共產黨利用上。共產黨一方面破壞國民革命，一方面分化國民革命軍，攻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。當時情況險惡，無以復加。 蔣總司令十六年春天在南昌對高級將領有過一次訓話，可以說明一切。 蔣總司令說：「在武漢的共產黨怕我們國民革命就要成功，怕我們國民黨就要成功，怕我們三民主義就要實現，共產黨沒有發展的餘地，共產主義不能在中國實現，共產黨也就要壽終正寢。所以，當我們東南沒有攻下以前，他們便想出種種方法，來攪擾我們。扣留子彈，斷我們的接濟；溝通敵人，使敵人用全副力量來攻擊我們。總要使得我們在東南作戰的軍隊完全消滅，這樣他們武漢共產黨就可以沒有防礙，共產主義就可以橫行中國。」

武漢既然惡化到這樣程度，在廣東，在黃埔的共產黨又和武漢聲氣相通，步調一致。 蔣總司令怕廣東也像武漢那樣惡化，動搖了北伐軍的根據地，分別派遣第二期同學胡靖安和陳超回廣州。暗中聯絡同學，防止共產黨的一切陰謀。他們兩人回到廣州以後，採取了兩種不同的方式進行工作。胡靖安先從宣傳着手，以文會友，聯絡同學。他和第三期同學周旭人（復）、第四期同學葉价人（維）、第六期同學石仁成，辦了一份週刊，名叫「三民週刊」。三民週刊在共產黨氣氛籠罩下的廣州，開始揭發共產黨的陰謀，批判共產黨的荒謬言論，可以說是反共的先鋒刊物。陳超回到廣州，則從組織着手，想把國民黨的同學秘密組織起來。他住在東山，着手聯絡第六期同學。他們的行動不够秘密，剛一開始，就被共產黨知道了。共產黨非常害怕陳超把國民黨同學組織起來，先法制人，造出「東山會議派」這頂帽子，大事宣傳，用來恐嚇同學，不敢同陳超接近，這樣一來，陳超的工作自然遭受阻撓。我們十一連連黨部開會，我聽到共產黨說，東山會議派是繼承西山會議派來的，是一脈相承的反革命組織。他們最可笑的说法，說西山會議派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兩個字的名字，東山會議派的首領陳超也是兩個字，所以說鄒魯、謝持和陳超是有反革命血緣的。他們宣傳的如此幼稚無聊，可是許多同學的確被他們嚇住了，聽到東山會議派，聽到陳超，真有些談虎變色，誰還敢和陳超接近呢。

這五頂反革命的帽子，共產黨靈活運用，那

一頂帽子適宜戴給那一位同學，他們就戴給那位同學，祇要被他們戴上，一切前途就完了。我們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有一位湖南籍的同學，叫做石仁成，湖南大學畢業，書讀得好，文章寫得好，多才多藝，是一位很有熱情的國民黨員。因為他的知識水準高，事理認識得深刻，富有正義感，又有不屈不撓的精神，看不慣共產黨胡作胡為，在他們連黨部開會的時候，他慷慨激昂，仗義執言，起來批評共產黨。結果，共產黨給他戴了一頂東山會議派的帽子，一再鬭爭，最後則設法把他趕出黃埔。（待續）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特

價貳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

，姓名附郵票貳拾元寄中外

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

郵免收寄費掛號加參元）